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

王存刚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世界大变局,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复杂,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国际领导力竞争。国际领导力融合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两大基本要素,是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作为新型大国,中国虽已在某些领域形成国际领导力,但就更广泛领域和更高层次而言仍存在不足。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提升需要通过外交领导力提升来实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提升自然就成为中国外交领导力提升的核心内容。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变数与希望同在的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提升的战略选择应当是:坚持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目标,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不结盟、“不打牌”;始终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世界谋大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引领、协调、塑造和示范作用,积极推进外交体制机制现代化。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国际领导力;外交领导力

【作者简介】 王存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天津 邮编:300050)。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05-0004-19

^{*} 本文为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专项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研究”(课题批准号:20AWTJ02-1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外交领导力竞争

外交领导力是外交行为体在跨国互动中形成的,其演进态势与世界形势及外交行为体自身状况有关。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首先必须明了当今世界的历史方位和基本特点。

(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判断,引发学术界和战略界的广泛关注。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又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①虽然报告未使用大变局这一名词,但其关于世界现状及走向的判断与大变局一词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对于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中国学术界已有多种阐释。大体而言,不外乎从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变迁、科技革命兴起及影响等几个变量着眼。^③由此形成的思考路径、得出的结论或判断无疑有一定价值,但未能触及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本质,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今世界大变局为何在规模和影响两个维度上百年间前所未有的。笔者认为,应当透过人类基本生存状态、全球发展格局和世界文明格局三个维度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描述、分析和预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如此,与上述三个维度的特性有关,即它们分别涉及社会分工、人类交往以及由两者交互作用而体现出来的人类整体进步三大基本要素,因而它们是衡量世界变化规模和影响的基本标准,也是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两大基本诉求的核心条件。

就人类生存状态而言,得益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势头强劲,在使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也使得当今“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的,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② 关于“百年”一词如何理解,中国学者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百年”不是严格的时间界定,而是着眼于长远看问题。有学者认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至少有五个时间维度,即500年、400年、300年、200年和100年。较多学者认为,“百年”是指1917年至今的100余年的历史。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其更切合原命题的真实含义。

③ 中国学术界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状况,参见朱锋:《近期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综述》,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第6—12页。

所未有”。^①就发展模式而言,在整个 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叶,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基底的欧美国家或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通过殖民化和全球化两种途径,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时间似乎成了全世界唯一发展典范和人类唯一正确发展方向;至于曾经具有局部重要影响并一度被视为可以同欧美发展模式相抗衡的所谓“苏联模式”,终因绩效快速衰减特别是 1991 年苏联解体而烟消云散。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 21 世纪后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整体实力呈显著增强态势,特别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有别于既往的发展模式,不仅意味着全球力量对比乃至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同时意味着国家发展模式并非欧美(也包括亚洲的日本)那些先发现代化国家所长期运营、着力倡导甚至强行推销的那种发展模式为唯一或最优。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2020 年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及其总体绩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知。换言之,国家发展模式已有了新的选项。^②由此,全球发展格局乃至发展方向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选择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的增长模式^③日益成为潮流。因为只有这种增长模式才可以使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人群,并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协调和共同发展,实现公平正义。就人类文明格局而言,中国和印度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成就和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两国战略契合点的不断增多、文化自信心几乎同步增强,意味着以两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再次复兴。而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衰落、对外行为模式日益由国际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化,欧盟内部不断升级的争吵和不断扩大的裂痕、跨大西洋关系的天日趋冷淡,特别是制度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不断降低,使得近代以来长期占据世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09 页。

②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0 页。

③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的研究显示:一国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它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两位学者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两个概念加以描绘和区分,认为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实现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汲取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详见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版。应当指出的是,胡锦涛、习近平均明确使用过“包容性发展”这一提法。

界文明格局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整体上继续衰落,影响力持续下降,^①世界文明格局进入相对均衡状态的可能性则显著增加,文明间平等相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流互鉴已不再是愿景,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居高临下对待其他文明的傲慢心态和错误做法已不再被忍受,而是遭到严厉批判和公开唾弃;在建立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能为关联度前所未有的人类不同群体提供基本道德准则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已不再被视为乌托邦,而正在成为可能。这样一种状态在世界历史上的确前所未有。也因此,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②

确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判断,对中国外交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外部战略环境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既面临“大变”的确定性,又面临“向何处变”的不确定性。中国外交既面临必须审慎应对的重大挑战,同时也面临应当牢牢抓住的重大机遇。就此而言,当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关键是做出正确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

(二) 国际领导力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内容

自国际关系产生以来,国家间竞争就是一种常态。^③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每次世界大变局总是源于国家间发展不平衡,且总会在衍化过程中引发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区别只在于卷入竞争的主体及数量、竞争的内容以及结果有所不同。就国际竞争的内容而言,主要涉及国际领导权、全球关键地区和关键领域等多个方面、多种层次。国际竞争的最终结果则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实现战略平衡和秩序稳定。

世界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整体发展方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可能性对世界各国的利害关系是大不一样的。主要大国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变局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动驾驭而非被动应对大变局,从而使不确定性演化为对自身有利的确定性。因此,国际领导力竞争是主要大国身处世界大变局时彼此竞争的核心内容,获得甚至独占国际领导力是主要大国的核心目标。所谓国际领导力(international leadership),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就是一国让他国接受其主导国际事务的地位的能力,是一国物质生产优势相对直接的后果;按照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的界定,国际领导力是“一国为实现集体目标而使用自身权力资

① 欧美有识之士日益强烈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方面的最新案例是:2020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国际安全论坛将“西方缺失(westnessless)”设定为会议主题,意指西方阵营正变得不那么“西方”,当今世界也没那么“西方”了,世界日益去西方化。其中的焦虑感和失落感显而易见。

②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即未产生“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自然称不上是“世界大变局”。

③ 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大体可用三个“c”来概括,即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与合作(cooperation)。

源组织协调集体行动的能力”,^①其关键因素是权力和目的;而“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际领导力,是指特定国际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之间的引领性影响力,或人类整体实践系统中主体性实践子系统间的引领性影响力”。^②上述三种关于国际领导力的界定尽管存在明显差异,但至少有两个共同点:(1)国际领导力是在国际互动中形成的,与集体行动有关;(2)国际领导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融合了实力与引领性影响力两大基本要素,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国际领导力具有多重属性。首先是多样性,即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不同领域都存在领导力问题。其次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既指不同国际行为体(通常是主权国家或者说是主要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同一领域的领导力存在差异,比如美国和英国、法国、德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它们在該组织中的领导力显然是不一样的;也指同一国际行为体(通常是主要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国际事务不同领域中的领导力存在差异,比如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力与其在全球层次上的领导力就有明显差异。最后是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一国国际领导力的上升与下降与该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下降并不完全同步。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头号强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③

二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强化外交领导力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已是客观事实。它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发生并交互作用,从而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

(一) 当今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所谓“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无疑意味着成为世界核心国家或主要大国。从世界历史看,任何一个被视为世界核心的国家或主要大国,除了必须拥有相当面积的疆域、一定数量的人口之外,还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从疆域和人口两个要素看,中国可以与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核心国家或主要大国相媲美;如将上述两个要素结合起来,甚至可以说罕

^①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1, No.3, 1996, pp.387-388.

^② 陈鹏、奚洁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际领导力问题探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7页。

^③ 参见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有其比。因此,论证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主要应涉及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

中国经济实力已稳居世界前列。无论持何种衡量综合国力的标准,经济实力都构成国家实力的核心要素。纵览国际关系史,一国要走近或者居于世界舞台中央,一定要先成为全球经济中一种构成性乃至领导性力量。^①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90865亿元人民币,连续第10年居世界第二位,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6%左右。按年均汇率折算,中国经济总量已达14.4万亿美元,与日、德、英、法四大发达国家的GDP之和大体相当。^②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是全球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已超过吸引外资总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年超过30%。

中国已具备较强的军事实力,能为国际社会提供较多公共安全产品。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防御性国防政策。但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的多元、复杂的风险挑战,又使建设同自身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利益相适应的稳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的国防费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也已实现革命性重塑。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维和、海上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加强国际军控和防扩散的国际合作,建设性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与相关国家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与国际社会合力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总之,日益强大的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③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已大幅增强。全球竞争力^④是全球影响力的来源之一。自1979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对各国竞争力进行评估和排名以来,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不断提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全球竞争力

① 对照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史和世界经济史,就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参见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盖尔·伦德斯塔德著,张云雷译:《大国博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宁吉喆:《中国经济再写新篇章》,载《中国信息报》,2020年2月4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④ 由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教授设计,2004年首次使用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可用于衡量一国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能力。GCI由12个支柱项目构成,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设备、市场规模、商务成熟性和创新。

排名第 28 位,是最具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且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创新能力等关键指标上得分靠前,在信息技术等重要领域的表现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不相上下。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2018 年,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为 4.4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 6.09%,均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列第三位。此外,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等新建国际金融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①

总之,中国的幅员、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特别是发展潜力、日益增长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华文明悠久辉煌的特质,^②使得中国快速发展在国际关系、世界历史和文明史三个方面的意义均十分重大。^③就此而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的确是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之一。

(二) 快速发展的中国亟须强化国际领导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国(great power),而是新型大国(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为有力论证这一判断,理论思想史的简要回顾和概念诠释是必要的。

何谓大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不少西方学者和战略家都曾对大国做过界定。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专门写过一篇题为《大国》(The Great Powers)的文章,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抵制其他国家的威胁,甚至不怕所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国。正如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批评的那样,兰克关于大国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布尔认为,当人们说到大国的时候,表达了三种意思:一是指两个以上地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二是指被称为大国的国家在军事实力方面占据一流地位;三是指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拥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依据这些标准,布尔将当时的美国、苏联和中国视为大国,而将日本算作潜在大国。^④布尔之所以将当时的中国列为大国俱乐部成员之一,理由是:“中国是核

① 仅在联合国 15 个机构中,目前就有 4 位中国公民担任主要负责人。

② 赵汀阳极具创造性地将中华文明概括为“旋涡模式”,认为“旋涡效应的关键在于它的持续向心力”“中国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刻度,一切存在的意义都在历史中展开”“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的方法论”。这些显然都是中华文明的特质。参见赵汀阳:《惠此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49—50、27—28、138 页。

③ 关于中国复兴的文明史意义,参见王存刚:《文明史视野中的中国复兴》,载《当代世界》,2017 年第 7 期,第 23—25 页;彼得·卡赞斯坦著,魏玲等译:《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④ 参见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0 页。

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外援助的提供国,而且最重要的是,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达成政治协议。”^①基于不同理论取向,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谓不同位置和国家利益的不同认识,直到今天“大国俱乐部成员的构成标准和行动标准还不清晰”。^②

对于何谓大国以及中国是否为大国也即中国的国家身份(identity)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有着独特且深嵌辩证法的精辟阐释。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首相吴努(U Nu)时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不强。”1956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重申了上述观点。同月,在《论十大关系》这一著名讲话中,毛泽东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国家身份的两重性:“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一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一个小国。”^③毛泽东晚年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特别是对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宣示,同样折射出他对大国内涵以及中国大国身份的独特理解。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大国观。1981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针对当时美国报刊和一些人宣扬“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的观点指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④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Maumoon Abdul Gayoom)时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⑤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又说:“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

①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173页。

② 马丁·格里菲斯、特里·奥卡拉格汉、史蒂芬·罗奇著,朱丹丹译:《国际关系关键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233—234、238、29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①1990年3月,邓小平强调:“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算一极,怎么样也算一极。”^②总之,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广大和GDP总量较大,也因为中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在国际安全与稳定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性、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具有“不怕鬼不信邪”的独特精神气质。^③

总之,所谓大国,既指规模,包括幅员、人口、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硬实力(hard power)”,也指影响力、塑造力、引领力和领导力,即“软实力(soft power)”。两大方面实力之和构成国家总体实力。当然,对于不同的大国来说,两方面实力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更强调硬实力。所谓新型大国,显然应该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有所区别,也就是要更强调软实力。

之所以将中国称为新型大国,其主要理由是:中国不是也始终无意成为霸权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任中国主要领导人均明确且反复宣示: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1956年11月,毛泽东在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短文中郑重指出:“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④1961年9月,英国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来华面会毛泽东时曾意味深长地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意思是过了50年中国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别的国家,50年内则不会。毛泽东明确回应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⑤直到晚年,毛泽东仍明确把“不称霸”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坚定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的关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是与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联系起来的。197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中国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③ 2019年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大国观的精髓。该白皮书写道:“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这里的“大国主义”是“霸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⑤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他还特别强调:“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①其后,江泽民、胡锦涛以不同话语诠释了这一基本国策的内涵,并切实予以践行。由此,习近平总结性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也因此,“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②可以确认中国抱持不称霸意愿的另一个有力例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均明确载入反对霸权主义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具有强大政治约束力的。回溯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政党史,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坚持不懈地宣示这一点,并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反对霸权主义同时自己不称霸绝不是外交辞令或宣传口号,而是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型大国,当今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强化国际领导力的问题,而是必须进行更为有效、更高水平的国际领导力建设的问题。^③这是一种历史使命,也是一种国际担当。

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建设已经取得积极进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关于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倡议等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所产生的重大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体现。但也应当承认,这种国际领导力还是有限的、局部的,与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并不匹配。这与中国长期奉行的“不当头”策略有关。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哈维

① 《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12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89、107页。

③ 对于中国是否需要国际领导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和战略界是存在争论的。庞中英、赵可金、陈志敏等明确主张中国需要国际领导力。参见庞中英:《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力——简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责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4—18页;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42—57页;陈志敏、周国荣:《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领导角色的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15—34页。海外学者对此表示质疑甚至明确反对。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就撰文认为中国“应该拒绝全球力量投射的诱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7/0329/1825050.shtml>,访问时间:2020年2月28日。贺凯、冯惠云则认为,中国已经与美国进行国际领导权竞争,参见贺凯、冯惠云:《领导权转移与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制度制衡与亚投行》,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第31—59页;贺凯、冯惠云:《中美国际领导权的竞争和共享》,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40—46页。

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的时候,针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是第三世界头头”的言论,明确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①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针对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的建议,再次郑重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②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得到了很好的贯彻。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始终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针,^③不扛旗、不当头,尽管此时中国也已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④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到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前台。中国领导人既认识到“这是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必然结果”,也认为这种状况“既使我们具有了处理重大国际经济问题、应对重大国际经济挑战的更好条件,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形势”,因此,仍然强调继续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埋头苦干,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强,“贯彻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世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转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力的观念进一步强化,^⑥中国国际领导力随之不断提升。^⑦这具体体现在倡议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个方面。

毋庸讳言,由于观念、能力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下的中国国际领导力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相对不足。作为国际互动的行为规范,国际规则的制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

③ 江泽民和胡锦涛均系统阐述了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必要性,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238页。

④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3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第285、440页。

⑥ 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参见《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07/c64094-26161930.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日。

⑦ 中国官方的表达为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受到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制定能力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国际领导力的核心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较深程度地融入了现有国际规则体系,并且正在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修订者和创设者,正由国际规则中相关优惠规定的受益者,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① 中国国际规则制定能力虽有提高,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仅就国际经济领域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就有许多超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该承担的义务而对中国明显不公平的条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所谓“特殊保障条款”以及在贸易补救条款下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总之,中国不仅承受着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体系下诸多不公平待遇,而且面临美欧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诉求而利用“国际规则”所实施的道义挤压。

第二,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相对不足。“国际议程设置是相关行为体通过议题选择与界定、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以及议程切入点的选择,最终将其关注的议题列入国际议程的过程。”^② 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也是一国是否真正掌握国际话语权、是否真正具有国际领导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2016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对此,习近平认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峰会。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我们首次全面阐述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③ 尽管如此,当前中国在国际议程设置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比如,在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问题上,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2009年就呼吁建立超主权货币,以创造“与个别国家脱钩并能长期保持稳定的一种国际储备货币”。^④ 但由于当时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加之欧元走弱,因此,周小川的提案虽然得到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响应,却很难成为正式国际议题,美元依旧充当全球通用货币,继续享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规则”课题组:《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载《中国市场》,2012年第50期,第19页。

②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38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84页。

④ Zhou Xiaochuan, “Refor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3/25/content_7612847.htm, 访问时间:2020年3月11日。

受“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

总之,中国已经拥有的国际影响力并不等于中国已经拥有的国际领导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领导力。要实现这种转换,需要有主体、有意识、有决心、有路径。

三 提升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鲜明政治属性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政治意义。因此,探讨当代中国国际领导力,必然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问题。否则,相关探讨就是空泛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一)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也是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③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使自己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 and 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④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更为深入。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史已经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命运所系”。^⑤

中国外交是中国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是顺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 《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30日。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0、3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1—342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0页。

理成章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定程序把自己关于外交的理念、理论、战略设计和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①并通过对外工作体制机制加以落实。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是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2019年11月,王毅在外交部建部7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7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外交不变的灵魂。我们的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外交事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外交的最根本政治保障。”^②因此,中国国际领导力必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加以体现,并加以实现。

(二) 外交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具有全面性和多维性。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均处于领导地位。它通过提出理念和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中国外交在观念、政策和行动等所有方面都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意志和行动。在开放的中国与开放的世界互动过程中,中国外交的使命就是要为开放的中国塑造良好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任务是“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③

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具有世界政治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和影响力,更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实践有着直接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④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既广泛开展政府外交,也深入开展政党外交。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2017年,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有来自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600多名中外方代表参加,与会政党数量和主办方的接待规格在世界政党交往史上前所未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日益走近世界政党舞台的中央,^⑤其影响已远超中

① 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都有关于国际形势分析、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宣示两方面的内容。这些具有鲜明原则性的内容都会在中央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加以具体体现。

② 《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接续奋斗》,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714481.shtml, 访问时间:2020年2月29日。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38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13—514页。

⑤ 《中联部部长宋涛回顾2019:中国共产党日益走近世界政党舞台中心》,载《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5日。

国国内,辐射至全球范围。

因此,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提升中国国际领导力,必须首先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领导力。

四 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提升的战略选择

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提升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变数与希望同在的当今世界,既要有战略规划,也要做艰苦细致的努力。

(一) 坚持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目标

邓小平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发展的核心依然是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实力始终是形成中国国际领导力进而也是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的关键要素。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认为,“中国一直将获得国家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战略核心,非常明智。经济这种权力,既可被转化为强制性权力,也可被转化为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经济权力是最有用、最可转换的权力形式”。^①

中国必须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已离不开中国。这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度直接相关。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产业链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②成为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没有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中国发展这一核心引擎,世界的发展也会失速甚至停滞。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应当始终把促进国家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放在对外工作的核心位置,始终从全人类高度看待和处理发展问题,一如既往地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贡献。这也是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尤其是不断提升其外交领导力的关键环节。

(二) 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大党大国外交总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尤应如此。成为大党大国通常是因为其能够独立制定国内和国际日程、能够赢得国内和国

^① 戴维·兰普顿:《中美关系中的力量与信任》,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4期,第44页。

^② 数据显示,在20个主要行业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参见《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2月27日。

实际上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与赞同,能够影响政策实施过程并有效协调初衷与结果、能够避免出现无效或南辕北辙的政策。^①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和精辟阐述。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②赓续这一精神,此后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中既秉持国际主义理念,又突出强调独立自主品质,^③并同大党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声明:“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④党的十二大报告则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原则,并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⑤其后,习近平又多次重申了这一原则,并提出了“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的主张,^⑥继承和发展了党际交往四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外交战胜了诸多艰难险阻,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也因此空前提升。这些宝贵历史经验值得永远记取。

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意味着彻底的不结盟。尽管面临守成大国的围追堵截、部分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信任或认同不足、国际舆论环境不尽友善等复杂严峻的外部战略环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仍须恪守不结盟原则,在发展党际关系及国家关系中不针对第三党、第三国,不与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结盟或建立准结盟关系,以确保外交上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任何形式的结盟主张都是不负责任的,付诸实践也肯定是有害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求同存异原则指导下,敞开胸襟、广交朋友、厚植人脉、普施善意,努力建成遍布全球、形式多样、相互尊重、稳定和谐的党际关系网络,以争取世界各

① 参见戴维·蓝普顿著,姚芸竹译:《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③ 参见宋涛:《不断推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 and 实践创新》,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⑤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页。

⑥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13页。

国政党、政治组织和普通民众对中国梦的普遍理解和有力支持,并使它们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既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

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还意味着在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中“不打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既不要打别人的牌,也绝不允许别人打自己的牌。从历史上看,处理对外事务中的打牌策略,实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机会主义是以牺牲长远、全局的利益,换取暂时、局部的利益,结果是十分有害的,因而也是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

(三) 始终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

对于大党、大国来说,是否拥有为世界其他政党和国家所认可的国际道义形象,是否遵循国际规范、遵循怎样的国际规范,^①事关重大。仅靠“地大国富,人众兵强”,只是具备了成为大党、大国的物质条件,如果操作失当,甚至有可能“与危亡为邻矣”。^②只有“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并且“德礼不易”,才能“无人不怀”。^③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始终坚守国际道义。对外交史极为熟稔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写道:“几乎是某种自然规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④很显然,基辛格在这里提出了成为主要大国的四个指标,道德就是其中之一。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看,主要大国如果不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或者丧失了道义制高点,其结果只能是出局。作为具有远大抱负的新型大国,中国的对外行为应当展现鲜明的道德属性,任何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而中国对外行为的道德属性只能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赋予并在实践中加以体现。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明确提出并切实践行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和国际正义观。这也是始终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其中,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既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衔接,以保持内外价值的统一;又应与人类共同价值相吻合,以保持与人类文明进步总体方向的一致。中国的国际正义观既应当符合马克思主义国际正义观,并从中国传统正义观中汲取合理成分,以保持其政治正当性及历史延续性;

① 阎学通的一项研究显示:“主导国的每一次具体行为可能分别遵循了实力规范、道义规范或双重标准规范,但总体的对外政策是以遵循其中一种规范为主的。”参见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8页。

② 《管子》(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74页。

③ 《左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8页。

④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又必须符合国际公认的正义标准,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尊重。^① 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外交核心价值观和国际正义观,那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正确义利观既适用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政党的关系。

(四)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构想引领自身努力方向,并提供前行的动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对未来世界有构想的政党,并为此不懈努力。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世界的宏大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外交正朝着这一伟大目标持续努力,并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梦想一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世界大同的道路肯定是漫长而曲折的,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做多领域、多层次的扎实工作。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习近平已经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号召:“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②

(五) 着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引导、协调、塑造和示范的能力

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几乎同步发生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既推动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也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要提升国际领导力,中国共产党要提升自身外交领导力,应当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中、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有新的更大的作为,发挥越来越大的引领作用,为不确定的世界寻找到确定的方向。这种作用不仅包括通过政府外交途径向国际社会持续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还包括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和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无法规避领导权问题)。^③ 中国共产党应当通过政府外交途径,在努力维护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安全和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基础上,积极支持各种国际

^① 关于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参见王存刚:《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0页;关于中国国际正义观的讨论,参见王存刚:《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正义理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94—113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8页。在2017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又向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出了类似倡议,参见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13页。

^③ 参见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4—28页。

组织的平台机制化建设,特别是要积极推动构建新的具有合法性、包容性、^①有效性的国际机制;在重大国际议题上主动出击,充分发挥引导、协调、塑造和示范作用,并愿意承担相应成本。

鉴于现代政治特别是国内政治的基本特点以及政党外交在全球外交格局和国家总体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还应在协调好与政府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创新外交理念和外交形式,既善于做其他国家大党、执政党和精英的工作,又要深耕与小党、在野党和草根的关系,在全球政党互动中更好地发挥引领、协调、示范和塑造的作用,并以建设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与世界其他政党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六) 积极推进党和国家外交体制机制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导源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时代中国外交体制机制的完善程度和运行绩效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的高低。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党和国家外交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加强各类涉外部门、驻外机构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且规范高效的对外工作大格局,更好地落实“党管外交”这一根本原则,更充分地体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属性。与此同时,要更加重视涉外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做好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事务和外交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的基础工程是党的全面领导力建设,通过固根基、补短板、重创新等途径,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并将其更好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外交事务中引领、协调、示范和塑造的效能。

(截稿:2020年3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对包容性国际制度的内涵及中国建立包容性国际制度必要性的论述,参见贺凯、冯惠云:《领导权转移与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制度制衡与亚投行》,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第31—59页。